

## 论《周易》风险观的当代意义

张文

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阜阳

**【摘要】**西方的风险社会理论具有鲜明的批判性，但其落脚点并非风险，而是对现代性弊端的一种批判。《周易》的风险观则具有鲜明的现实性与实践性，《周易》认为风险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人类必须学会和风险并存。《周易》提出了五种应对风险的要求：泰然处之，祸福相倚，慎始敬终，祸福由己，恐惧修省。这种风险智慧今天仍然极具价值。

**【关键词】**风险；《周易》；风险策略；风险意识

**【收稿日期】**2024年10月25日

**【出刊日期】**2024年11月14日

**【DOI】**10.12208/j.ssr.20241001

###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risk view in the Book of Changes

Wen Zh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Abstract】** The Western risk society theory is highly critical, but its focus is not on risk, but on a criticism of the drawbacks of modernity. The risk view of the Book of Changes is highly realistic and practical. The Book of Changes believes that risk is part of human life and humans must learn to coexist with risk. The Book of Changes puts forward five requirements for dealing with risks: stay calm, fortune and disaster depend on each other, be cautious at the beginning and respectful at the end, fortune and disaster are up to oneself, and be fearful and self-reflective. This risk wisdom is still extremely valuable today.

**【Keywords】** Risk; "The Book of Changes"; Risk strategy; Risk awareness

20世纪以来，“风险社会”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等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家对现代社会风险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西方风险理论主要探究风险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并以现代性批判为出发点，其根本指向并非风险而是风险产生的社会原因，由此就导致风险理论更多地关注社会文化层面，希望通过批判现代性弊端来减少风险的产生，至于如何应对风险，以及对风险自身的认识，并未做太多探究。相比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周易》中有着丰富而深刻的风险观念，这些风险观念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至今仍指导着中国人认识风险，应对风险，将之与西方风险理论对照研究对于应对当下及未来的风险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周易》本为卜筮之书，而古人求诸卜筮就是为了找到应对未知风险的办法，所以《周易·系辞下》云：“《易》之兴也，其于中

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sup>[1]</sup>对此，北宋李觏在《易论》解释道：“噫！作《易》者既有忧患矣，读《易》者其无忧患乎？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sup>[2]</sup>可见，对于风险的关注是《周易》成书的基本出发点。

《周易》风险观对于反思西方风险理论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五个层面：

#### 1 泰然处之：应对风险的积极态度

一般认为，风险就是可能出现的危险，是一种对人类带来负面影响的自然、社会现象。粗观之，这种观念并没有什么可质疑之处，可是对照《周易》之风险观之后，会发现，《周易》将风险视为世界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周易》之出发点虽然是规避风险，求得吉利，但是这种规避并非要消灭风

险，而是要顺应风险，即是要找到一种与风险并存的生存方式。按照《周易》的基本原理，每一卦代表一种境遇，每一爻代表这一境遇中的一种可能性。统计发现，代表风险或缺憾的“凶”“悔”“吝”“灾”“厉”在初爻至六爻的每一爻中皆有显现。这就说明，任何一种生存处境都包含着出现风险的可能性。

关于风险之存在，《周易·无妄》说：“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意思是路人顺手偷走了拴在路边的牛，但人们却怀疑是村庄里的人偷走的。这是绝对的无妄之灾。然而在卦辞中反复强调“利贞”、“可贞”，认为人只要按照正道行事，锻炼自己过硬的本领，这种无妄之灾并不会带来致命的伤害。《周易·离》云：“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离卦讲的是辉煌之时，而这句话以火之突然熄灭为喻，表达了辉煌之时也可能存在着突如其来的风险。然而看似致命的风险并没有导致绝境的出现，因为九五以悔恨之义行反省之事，“出涕沱若，戚嗟若，吉。”哭泣在这里就是彻头彻尾之反省，于是突如其来之风险又迎来了自己新的转机。《周易·乾》以“自强不息”立世，刚健之气充盈全卦，然而初九“潜龙，勿用”，是由于君子力量薄弱之时不能急于成事，否则潜在的风险就会到来，经过九二之历练，九三刚刚壮大起来，又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时刻警醒君子要防范风险的出现。而九五“飞龙在天”的功德圆满并不能冲淡上九对于“亢龙有悔”的担忧。《周易·泰》卦义是天地相交，畅通无碍，大吉大利，一个“泰”字甚至已经承载着中国人对于家国美好的一切愿望，然后上六却不忘提醒一句：“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国泰民安之时，城墙倒塌，紧张的气氛顿时升起。朱熹为此解释道“此亦事势之必然，治久必乱，乱久必治，天下无久而不变之理。”<sup>[3]</sup>

根据上述几个例子足以发现，《周易》认为风险的存在是有多重可能性的，因此一部《周易》就是“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周易》并没有因为风险之常存且不可控而走向悲观主义，相反却积极引导人们“乐天知命”，泰然处之。《周易·系辞上》云：“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

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系辞》所述，是要表明研读《周易》之人可以由此把握天地之本然变化，天地之中有生必有灭，有忧必有喜，有安逸必有风险，能以超越之心接受这种变迁，人便会在有忧患意识之同时，亦能有乐天知命之愉悦。于是，生于忧患而泰然处之，便成为一种理想的对待风险的心理状态。

其实，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人们就在寻求消除风险的办法，技术之进步就是人们应对风险的最可靠法宝。然而在罗素看来：“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境，这片无人之境就是哲学。”<sup>[4]</sup>其实风险并非是一个科学问题，因为风险是一种偶然性的常在，可预测又超出人们预测能力的，解决风险问题的终极办法并非依靠技术去消灭风险，而是探讨一种与风险共存的生存方式。《周易》之风险观便是这种智慧的集中体现。所以从更广泛地意义上来说，《周易》并非仅局限于讨论古代社会之风险问题，而是具有恒久的启示价值。

现代社会的风险观念是围绕技术展开的，技术具有的精确性、可测性使得技术天然地被人们寄予厚望，用以解决风险问题。这种对技术的崇拜最终导致了人们将一切安全的愿望都寄托在技术身上。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工具理性或者技术理性之所以会获得现代社会的青睐，是因为工具理性“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sup>[5]</sup>于是，技术的可预测性成为达成某种目的的基本保障，在达成消除风险这个目的的过程中，技术被寄予厚望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正如刘岩所述：“建立在逻辑演绎和经验归纳基础上的概率值在判定今天的全球性社会风险问题上是不适用的，其后果是将无法计算的、后果严重的、全球性的、人为的社会风险排除在视野之外，此时单纯依靠所谓确定性知识的判断就充当了‘风险制造者恰恰在逃避风险’的作用。”<sup>[6]</sup>现代社会不断出现的生态危机、军事危机、政治危机及其远远超出传统危机的杀伤力使得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技术，怀疑技术。海德格尔说道：“预计到某物，也即考虑到某物，

指望某物，也即期待某物。以此方式，一切对现实的对象化都是一种计算，无论这种对象化是以因果说明的方式来追踪原因之结果，还是以形态学的方式来阐明对象，还是确保一种序列和秩序联系的基础。”<sup>[7]</sup>然而，计算是否能穷尽世界？如果无法穷尽，那么又如何确保技术的可靠性？

再次回到《周易》的风险观，就会发现，倘若以“技术”为某一卦之卦名，该卦卦辞中必然会出现“厉”“凶”等警示性判断，同样也可能出现“无咎”、“悔亡”等无风险判断。理性作为唯一原则的现代社会实际上就是一种“单向度社会”，而《周易》反复强调的是世界之整体性与变易性，于是，试图以某种单向度的知识一劳永逸地解决风险问题自然也就成为痴人说梦。当然，同样可以做出判断，任何一种以批判现代性甚至否定现代性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也不可能找到一种完全消除风险的知识体系。人们能做的，就是无时无刻不在现有条件下，积极而谨慎地去面对风险。而《周易》对风险泰然处之的态度并非来源于对风险的无知和忽视，而是尽可能在一种困境中高扬主体的精神，从而敞开与忧患并存的恒久之道。

## 2 祸福相倚：应对风险的辩证思维

消灭风险是现代知识体系的直接目标，而福祸相倚则是中国人之共识。这种观念上的差异并非两种文化形态的“各具特色”，而是一个值得深究的价值问题。因为两种不同观念最终会在应对风险之时生成两种不同的选择。下面分而论之。

首先就《周易》而言，祸福相倚是其基本易理之一。略举几卦以示之。《周易·否》就字面意思是指闭塞不通的境遇，卦辞亦言：“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如果这个世界一团死气、闭塞不通，那么天地万物无以生息，而人道如果了无动态、闭塞不通，万事也就无法运行。可见“否”之不利大矣。然而《否》之初六却说“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即是说，否之方始，闭塞之形势尚未形成，万物犹有相通之处，不利之中并非毫无机会，福便隐藏于祸之中。九五更是以“休否”为转机，阐释了“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道理，即是说，即使最不利的时候，只要能及时停止否之闭塞，危亡之际也能稳如泰山。上九“倾否，先否后喜”则是苦尽甘来，悲尽喜来，否极泰来之义。

另有《周易·坎》专论风险，以“重险”释坎，可见风险之严重，尤其是上六谓：“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适逢牢狱之灾，三年仍不得出，可见不吉至极。然而卦辞却说：“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可见险之极致也并非毫无转变的机会。以文王拘禁于羑里七年之事可见绝境之中犹有希望。《周易·蹇》所蕴含的祸福关系更加明确，蹇就是遭遇艰难之义，然而卦辞中反复强调艰难之后必有后福，更有“大蹇，朋来”的判断，即是说大蹇之时，外部力量也会纷纷现身，帮助人们走出困境。

如前所述，消灭风险是现代知识体系的直接目标。如果将风险作为人类生活之毒瘤去看待，那么必然会采取一种彻底手术的方式消除风险的危害，这就是现代人赖以抵制风险的法宝——技术或者理性。然而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技术作为一种保护性措施，其自身也是一个“福祸”共同体。于是，以《周易》观之，技术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风险。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思想家的普遍认可。

关于技术局限性的批判在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传统，而以贝克和吉登斯为首的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家都是将自己的论断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之上的，批判现代性，其实就是批判技术、批判西方的工业社会。在贝克看来：“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sup>[8]</sup>然而事实却是：“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sup>[9]</sup>吉登斯也有类似的言论。“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那种‘人造风险’，它们来源于科学与技术不受限制的推进。科学理应使世界的可预测性增强，但与此同时，科学已造成新的不确定性——其中许多具有全球性，对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我们基本上无法用以往的经验来消除。”<sup>[10]</sup>所谓“人造风险”是和“外部风险”相对应的概念，后者是传统社会风险的基本表现，即风险并非由于人类行为产生，而是由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自身的客观性决定。现代社会则不同，人造风险的强度空前增强。“我称之为风险强度的东西肯定是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可怕的外表’的

基本要素。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sup>[11]</sup>

对比发现，“祸福相倚”的观念在面对风险问题时有双重优势：一方面是对风险观念的矫正。彻底规避风险观念导致人们将希望寄托给一个万全之策——比如技术，然而事实是，并不存在什么万全之策，所谓的万全之策依旧包含着风险的可能性。于是，就有必要对所有消除风险的策略重新审查，这种审查意味着一种开放性策略的引入，可以有效避免对技术的迷信和对风险的忽略。另一方面，在应对风险的实践过程中，祸福相倚作为一种事实既可以帮助人们寻找新的机遇，同时也有利于人们将此作为一种安慰性的观念，重新调动起人们在风险之后的积极性，进而更快地发挥人们的主动性，消除灾难在心理层面造成的创伤和痛苦，让灾后重建不再附带太多哀悼和悔恨，并且也在事实上激发人们去寻求新的可能性。

其实吉登斯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也发现，风险具有二重性。“风险一方面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我们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些风险所伴生的各种机会。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活力的原则。”<sup>[12]</sup>吉登斯的观点与《周易》不谋而合，揭示了风险的二重性，启示着人们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可以说，“祸福相倚”的观念应该成为一种人类共识，以促进人们更好地应对风险。

### 3 慎始敬终：应对风险的基本策略

如果《周易》一味提醒人们重视风险之不可消除性以及风险中蕴藏着机遇的可能性的话，那就会导致人们不可避免地走向消极无为的被动之路。其实，在《周易》的世界观设定中，天作为人生存的整体环境确实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人要知天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是以一种被动的状态去顺应天命，因为天命同时赋予人参与和创造的机会，天命并没有剥夺人的自由。就像人类现在只能生存于地球之上一样，必须学会适应地球环境带来的约束，但人类仍在开创人类自己的文明。

敬畏天命并创造生命，是《周易》的基本精神。

这种能动性在风险观方面的体现就是，《周易》一直要求人们发现风险，见微知著，进而规避风险。在《周易》看来，对风险的发现要在风险的显现之前完成，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原本没有任何征兆的风险成为影响大局的致命因素。那么，看起来，问题的重点就落在了如何观察和发现风险了。《周易》认为，风险的出现有两种可能，其一就是在细微处埋藏着风险的可能性，一旦条件满足，这种风险就会迅速成长起来，这就是风险的渐进性；其二就是在事件趋于圆满之际，风险突如其来地显现，造成重大危害和打击，这就是风险的突变性。

首先，就风险的渐进性而言，需要在初始状态中把握一切可能导致风险的因素，发现风险出现之端倪。《周易·坤》初六云：“履霜，坚冰至。”意思就是当冰霜在大地出现的时候，寒冷的冬天就已经开始迈进了。显然，其指向绝不是节气之变化，而是要人能在端倪处发现事件的倾向性，进而更早地提出预防的措施。《周易·姤》以不期而遇为卦义，初六云：“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也就是说在面对偶然未知之可能性的时候，停止不前，谨慎行事则吉，轻狂躁动、盲目冒进则凶。此时的吉凶就来自于偶然性中埋藏着的风险。也就是说，初六并不清楚风险是什么，但是在面对未知情况的时候，首先预想了风险的存在，如此就可以以谨慎的态度去稳步前进。《姤》并不否定前进，而是提醒人们，当无法确切把握未来之可能性的时候，要以如履薄冰的态度前行，而非一味自恃刚强、不听劝阻。

其次，就风险的突变性而言，需要在事件的完成状态中仍旧保持着对风险的警惕。一般认为，在成功之际，各方因素已经凝聚，大势所趋、所向披靡，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周易》却不断提醒着风险的存在。由于初始状态中的主体仍处于弱小阶段，任何风险都会直接造成致命打击，所以此时的主体一般会谨慎行事；而完成状态中的主体则往往会忽略风险的存在，由此导致物极必反、乐极生悲。据统计，《周易》六十四卦中，“凶”“厉”“吝”等不利词语共出现 121 次，其中有 40 次出现在第三爻，有 34 次出现在第六爻。单就“凶”而言，《周易》中共出现 52 次，其中 12 次出现在第三爻，18

次出现在第六爻。之所以呈现出这种分布，是因为《周易》之第三爻乃下卦之上，经历初爻与二爻的积累，三爻就易于松懈大意；而上爻则是全卦之最上，是卦义完满之时，此时成就最大，风险亦最大。比如《周易·乾》之上爻“亢龙有悔”，即是提醒刚健之精神亦应有张有弛，一味刚健，不知婉转，则有悔。而《周易·既济》之上爻“濡其首，厉”，即是提醒人们在万事皆备、功成圆满之际，对风险之忽略极易发生。后世欧阳修之“祸患常生于忽微”是对此理的高度概括。

其实，不论是对初始阶段的风险端倪的察觉，还是对完成阶段的风险可能性的控制，都是对风险自身规律的把握。后世张栻将《周易》的风险观总结为：“既惧其始，使人防微杜渐；又惧其终，使人持盈守成。要之，以无咎而补过，乃《易》之道也。”<sup>[13]</sup>可谓得其真义。可见，那种认为专家系统足以全盘应对风险只能是一种空想。贝克说：“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和超常规性，使专家在面临新科学技术时，往往多注重科技的贡献性而忽略其副作用，或故意隐瞒其副作用，以至于人们在开始使用科技时，就已经为风险埋下了发作的种子。”<sup>[14]</sup>因此，解决风险的关键就成为：发现并遏制风险的蔓延。

为此，德国社会学家卢卡斯·卢曼提出了对风险的一阶观察和二阶观察。卢曼认为，人们需要通过双重观察的方式发现风险，第一重是对外物的认识，即如何将一个现象的各个层面条分缕析地呈现出来，这就是一阶观察。一阶观察有助于发现现实的各种风险可能性，但是仅有一阶观察还不够。一阶观察受限于人类认识的发展水平，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一阶观察只能达到“想象”中的完美。因此必须从更高层面对观察本身展开批判和反思，这就是二阶观察。在卢曼看来，“只有当人们将观察者当作观察者来进行观察的时候，才属于二阶观察。‘当作观察者’意味着涉及对方观察的方式和方法。”<sup>[15]</sup>二阶观察实际上是对一阶观察的批判，是对人类现有认识能力的批判。通过一阶观察与二阶观察，卢曼建立了系统而极致的观察机制。这种既依靠观察又不断反思观察能力的风险应对方法可谓是慎之又慎。

然而，受限于人类认识水平与世界的复杂性，风险依旧是不可消除的。卢曼的观察理论仍旧试图全面控制风险，他希望通过对现有条件尽可能全面的分析来把握可能出现的风险。相比而言，《周易》对风险的判断并非建立在知识论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辩证法之上。《周易》认为风险的出现是必然的，必须以“祸福相倚”为应对风险的基本思路，在无风险环境中也保持着忧患意识，这就构成了一种慎始敬终的风险应对策略。《周易》风险观对卢曼观察理论的补充正在于此，既然任何事件都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那么一切在风险观察范畴之外的因素也应该考虑在内。由此，人造风险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 4 祸福由己：应对风险的责任意识

西方社会学家将风险社会的形成归咎于现代性，认为正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风险。然而在《周易》的世界观中，现代性的到来仅仅是一种势之必然，与人类生存的任何一个时代没有根本的差别。现在，人们生存于一个技术日渐发达的时代，人们利用并操控着技术，却不愿意为技术带来的风险承担责任，反而将责任推卸到技术身上。固然可以说，现代性批判是对人类的理性的反思，然而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时代的风险，人类越是建立起复杂的生产、流通、交往等社会关系，风险就越是集中地显现为“人造风险”。因此，时代并不能作为风险的责任主体，风险的责任主体只能是人。

《周易》成书于农耕时代，此时人类所面临的风险更多地来自于自然界，风霜雨雪，高山深渊，都会成为人类需要应对的风险。然而《周易》仍旧将人作为风险的责任主体。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德是属人的，与是否遭遇风险似乎并不相关，然而《周易》的基本思路就是，人必须学会与天然之风险共存，不怨天，不尤人，在风险中寻求扭转困境的契机。既然对于客观的风险只能选择顺天而动，那么改变现状的契机就只存在于主体之中。通观《周易》全书，第一爻多吉少凶，是因为第一爻多有戒惧之心；第三爻、第六爻多凶，是因为三六处上，易狂妄自大。这其实都是对人之主体性的重视。

《周易》将风险之责任归之于人，树立风险的

责任主体并非出于法律追责的考虑，而是出于对风险的重视和预防。当人人都被视为风险之责任主体时，人们就会主动地反思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这种看似日常的道理恰是现代社会的严重缺失的。贝克发现，现代社会找不到风险的责任主体，他称之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莱茵河上游有一个阿尔滕斯特德小镇，镇上居民遭受到化学物品砷和氟的侵扰，当地居民出现了恶心、头痛、皮疹、发烧等症状。污染源显而易见，来自于一个水晶加工厂的大烟囱。居民为此起诉了这个工厂。然而最终却无人承担责任，此事不了了之。<sup>[16]</sup>贝克将这种现象称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在贝克看来，由于现代社会分工导致个体只是复杂劳动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法承担起全部责任，而这也就导致责任意识的淡化。这种不负责任的极端表现就是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提到的，由于集中营的理性化分工导致大屠杀的参与者毫无责任意识。

然而不负责任并不意味着没有责任。当人们将目光集中于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之上时，会发现，现代技术在带来风险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数便利，人们在利用技术满足生活需求的同时，毫不犹豫地一切危机的根源归咎于技术，自己却仍旧不愿意放弃任何现代文明的成果。每一个人都是风险的责任主体。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等等，与每一个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种“与我无关”的托辞，只是主体逃避责任的策略，而非是现代性的后果。因此，可以说，将风险归咎于现代技术恰恰是由于现代社会责任意识的隐身，也就是说，人们只关注自己在做的具体的、片断的行为，而不考虑行为整体带来的社会风险，并选择性地逃避这些责任。于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只是风险事件的表面，责任意识的缺位才是问题的关键。

对比现代社会，《周易》似乎过多地将风险责任置于主体之上，对主体形成了压迫之势。然而，一方面，对主体责任的凸显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在面对风险时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是风险应对的最大法宝。另一方面，主体以担当风险为己任，凸显了人性的光辉。中国古代皇帝的“罪己诏”就是一个明证。中国古人不会愚蠢到认为天灾乃是帝王之德行不修，可是哪怕是惺惺作态的“作秀”，“罪己

诏”也迅速起到了承担责任、凝心聚力、共抗风险的作用。这种风险担责不仅不会削弱帝王的地位，反而有助于增强帝王之至高无上的权威。

贝克曾经指出，风险的全球化期待责任的全球化，“正是这种对全球风险社会进行的自省与反思打破了寂静无声的状态，并且使得全球性成为人们在全球意义或全球层面上对其自身行为进行自省与反思后而产生的痛苦的认知结果，使得人们试图重新构建可以应付各种冲突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框架，并在此意义上形成着眼于全球层面上的新的联盟。”<sup>[17]</sup>然而就西方的现实来讲，贝克并不认为这种合作可以顺利实现，因为利益高于责任意识一直左右着西方政坛。可是正如《周易·系辞上》所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只有全球合作，才有可能以人类之全体应对文明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的危机。值此之时，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就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担当，而否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言论也恰恰凸显了逃避责任的极端自私心理。

### 5 恐惧修省：应对风险的反思精神

风险历来都不是单一事件，尤其是重大风险给人类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切尔诺贝利核事故、“9.11”恐怖袭击，新冠疫情，都对理解人类的生存境遇有着积极的意义。风险的影响并非孤立的，风险之影响也并不以风险之消除为其终结，正确的对待风险的态度应该是：将风险视为人类生存过程中的一个特殊事件，以此为契机反思过去，筹划未来。这也是《周易》风险观的要义之一。

《周易·观》讲到：“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意思是说，仰观祭祀之礼，即使不去关注其中细节，也会让心中充满崇敬之意。这里的“观”并非是对某一社会事件的分析，而是对仪式的观瞻。仪式是充满象征意味的，借由这种充满象征意味的仪式，主体在“观”的过程中获得了认识上的提升与境界上突破。现在，同样需要将风险作为一个象征性事件，通过对风险的“观”，引发人们对社会文化系统各个方面的反思，甚至引发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反思。重视风险并反思风险，是人类在历史实践过程中理解自身、推进文明的基本动力。《周易·观·象》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圣人所作，

无非就是将人类历史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作为“观”之对象，从中发掘可以借鉴的经验。《观》卦将风险置于人类发展的全部历程之中来“观”，从而形成了知古鉴今、引以为戒的风险观。

当然，“观”可以涵盖一切历史事件，也可以从一切过去经验中寻求通往未来的道路，为何“风险”会成为“观”之首要选择呢？《周易·震》，云：“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意思是说雷声大作，万物惊恐，于是谨言慎行获得吉利，君主之令唯有威严震恐才能保证其行之有效。

《象》曰：“君子以恐惧修省。”在震卦中，恐惧并非是消极的，而是具有积极的价值，恐惧之积极价值就在使人从生活之惯性中警醒，进而重思当下之行为合理性。朱熹在《周易本义》中解释道：“以阴居阳，当震时而居不正，是以如此。占者若因惧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则可以无咎矣。”显然，震卦更关注的是风险之后人们生活的继续展开，如果能以恐惧为契机，思过往之不足，去过往之不正，那么新的风险就会提前得以规避。总之，风险，尤其是重大风险，一方面给人们带来的是巨大的心理创伤，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人们冷静下来，重思过往。这就是《周易》对于风险意义的开掘。

### 参考文献

- [1]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下文周易引文皆引自本书.
- [2] 李觏.李觏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53.
- [3] 朱熹.朱子语类卷[M]七十,朱子全书第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353.
- [4] 罗素.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1.
- [5]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
- [6] 刘岩.风险社会理论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1.
- [7]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3.
- [8] 乌尔里希·贝克.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19.
- [9]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0.
- [10]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15.
- [11]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10.
- [12]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的复兴[M],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66.
- [13] 转引自.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05.
- [14] 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45.
- [15] [德]尼克拉斯·卢曼.风险社会学[M].孙一洲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317.
- [16] 1996年法院审理案件给出的结论是49人被判有期徒刑,而在具体执行时,其中18人免于执行,31人无限期缓期执行,最终无人负责此事.案例过程可参见.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J].王武龙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
- [17] 乌尔里希·贝克.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J].王武龙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2.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